

Wasserman, J. (2020). Science lost, science found in the post WWII Austrian economics movement: The case of Emil Kauder.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33(1), 107-120.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二战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运动中的科学遗失和科学发现：埃米尔·考德的案例 雅内克·瓦塞尔曼（Janek Wasserman）

摘要

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中，埃米尔·考德经常在洗牌中遗失。本文重构了他的思想传记。他的生平轨迹与他的奥地利同胞大相径庭。他在德国出生并接受培训，其教育背景与同龄人相差无几。他一开始是师从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经济历史学家，在 30 多岁时成为边际主义的拥护者。学术认可的缺乏限制了他的研究机会和理论工作，但他通过为年轻的路德维希·拉赫曼指导边际效用理论，塑造了后来的奥地利学派运动。纳粹主义兴起后，作为犹太人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遭受了强烈的迫害。他的移民之路艰辛而颠沛流离，导致他在战后拥有不拘一格和四处奔波的职业生涯。尽管有这些障碍，考德还是为奥地利学派思想在美国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对卡尔·门格尔在日本的藏书的辛勤而近乎痴迷的编目，以及他关于奥地利边际主义的文章——最终在 1965 年的《边际效用理论史》（*History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中达到了顶峰。与小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摩根施特恩和米塞斯等不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友好相处，并被穆瑞·罗斯巴德赞许地（且始终如一地）引用，考德提供了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理解，它吸引了传统的不同部分，但让他远离他更有理论倾向的主持人。解开考德思想传记中错综复杂的线索，揭示了大量关于奥地利主义现状及其在 20 世纪中叶美国知识界中的位置的内容。

关键词 埃米尔·考德、边际效用理论、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思想史、德国移民、卡尔·门格尔

JEL 分类 B1、B13、B25、B53

在过去的 15 年中，人们不仅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而且对它漫长而复杂的历史重新产生了兴趣。人们已经决定从运动的目的论和“工具性”

（Boettke 2002）的历史，转向接受一个已持续 150 年、跨越六七“代”和两大洲的传统的普世主义。我们受益于哈耶克、米塞斯和熊彼特等主要人物的智识传记。博弈论的思想史和“文明的维也纳学生”为奥地利学派对现代思想的一些最持久的贡献提供了迷人的历史背景。奥地利和德国的学者扩展了我们对早期“维也纳经济学派”的认识，尤其是卡尔·门格尔、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汉斯·迈耶，从而丰富了对门格尔的时代到德奥合并（*Anschluss*），维也纳社会科学思想密集知识网络的理解。虽然从门格尔到庞巴维克到米塞斯（到罗斯巴德）的直线传承的辉格式叙述继续吸引着一些奥地利学派追随者，但重新引入熊彼特、摩根施特恩、舒茨和其他人，丰富了对奥地利学派的社会、文化和知识基础及其在二十世纪历史中的作用的理

最近，流亡奥地利人的战后活动引起了思想史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和其他人的关注。全球化、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国际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将哈耶克、朝圣山学会以及一个由学会、智库和全球研究机构组成的网络置于了他们分析的中心。经常有争议，偶尔也有阴谋，这一工作中最好的部分有力地展示了思想是如何被构思、传播和在政治上运作的。这一工作——关于日本经济奇迹、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关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或布雷顿森林货币秩序——将“其他”奥地利人带入了历史视野（Walpen 2004; Schmelzer 2010; Metzler 2013; Slobodian 2018）。弗里茨·马赫卢普、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和“已故”的哈耶克获得了新的赞赏。他们的战后工作，尤其是作为制度建设者和知识企业家的的工作，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帮助重塑了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政策以及治理理念。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被理解为一套理论准则——奥地利人的后期活动也反映了许多从哈布斯堡时代起就支持了这场运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假设。奥地利人在“荒野”中的恢复，或在移民后对其“遗留行李”的取回，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趋势（Klausinger 2006; Krohn 1988; Craver and Leijonhufvud 1986; Judt 2012; Dekker 2016; Wasserman 2016, 2019）。

上述发展代表了我们在理解奥地利传统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幸运的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仍有大量行李需要整理，并且“遗失的科学”要融入我们不断发展的运动图景。例如，奥地利人对经济重建和发展的态度和想法——无论是在一战之后还是二战之后——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里夏德·许勒尔（Richard Schüller）、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尤其是保罗·罗森施泰因-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都应该得到更严肃的学术研究。虽然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写下这些想法和人物，但今天我将重点关注一个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体现奥地利传统中“科学遗失，科学发现”这一主题的人物：埃米尔·考德。

埃米尔·考德是一位很容易在洗牌中遗失的学者。与许多奥地利人不同，考德没有留下文献档案，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他的学术著作和零散的通信来拼凑他的传记和智识发展。考德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他的传记轨迹与他的奥地利同胞大相径庭。在德国出生和接受培训，他的教育背景与同龄人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学术认可的缺乏限制了他的研究机会和理论工作。他的移民之路艰辛而颠沛流离，导致他在战后拥有不拘一格和四处奔波的职业生涯。尽管有这些障碍，考德还是为奥地利学派思想在美国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对卡尔·门格尔在日本的藏书的辛勤而近乎痴迷的编目，以及他关于奥地利边际主义的文章——最终在 1965 年的《边际效用理论史》中达到了顶峰。与小卡尔·门格尔、摩根施特恩和米塞斯等不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友好相处，并被穆瑞·罗斯巴德赞许地（且始终如一地）引用，考德提供了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理解，它吸引了传统的不同部分，但让他远离他更有理论倾向的主持人。解开考德思想传记中错综复杂的线索，揭示了大量关于奥地利主义的现状及其在 20 世纪中叶美国知识界中的位置的内容。

埃米尔·考德没有留下完整的回忆录或自传，也没有关于他移民前生活的记录，这使得讲述他的故事更具挑战性。他于 1901 年出生在柏林的一个波希米

亚血统的犹太家庭——比哈耶克晚两年，比哈伯勒晚一年，比马赫卢普和摩根施特恩早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进入柏林大学，师从沃纳·桑巴特，后者当时以其经济思想史巨著《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及其对资本主义出现的推测而闻名。考德的论文（Kauder 1924a）——这成为了他的第一本出版物（Kauder 1924b）——带有桑巴特的历史主义方法和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观念对经济思想影响的著作的印记。他出版了一本关于 17 世纪奥地利博学者和冒险家约翰·约阿希姆·贝歇尔（Johann Joachim Becher）的知识传记，将贝歇尔的有机主义经济理论置于重商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思想的更广泛趋势中。论文揭示了考德对历史背景的关注和他对早期现代经济思想的了解，但尚未对当代经济科学表现出关注。例如，尽管贝歇尔的工作与奥斯玛·施潘（Othmar Spann）的普遍主义经济学路径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考德并没有提及他——鉴于施潘会在考德随后的经济学说著作中占据显著位置，这是令人惊讶的。在 20 世纪 20 年代，考德仍然在桑巴特的轨道内，不仅引用了他的导师（*Doktorvater*），而且还定期参加他的研讨会，该研讨会在林登大街（Unter den Linden）一家咖啡馆里，在“学院氛围”中举行（Backhaus and Mueller 1994; Backhaus 1996; Lenger 1994; Sieferle 1995）。

在他的博士论文发表后，考德似乎没有完成任教资格（*habilitation*）论文，这意味着他的教授之路——这条路对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的所有德语学者来说已是非常狭窄，对犹太血统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已经结束。因此，与年轻的奥地利人相比，他的学术前景受到了限制。他还担任过私人教师，主要在柏林商学院（*Handelshochschule*）任教。这些限制限制了他的学术努力，但他在 1932 年成功完成了面向初学大学生的理论经济学入门书，这本教科书显示出对奥地利学派思想刚刚萌生出的兴趣（Kauder 1932）。

考德转向现代经济学和边际效用可能始于 1930 年左右。在 1956 年给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一封信中，他报告说在 1930 年会见过这位年长的奥地利人，他可能在那时参加了环城大道（*Stubenring*）研讨会。¹这也不是一次单独的维也纳之行，因为他从 1932 年开始与奥斯卡·摩根施特恩通信。他访问了摩根施特恩担任所长的商业周期研究所（*Institut für Konjunkturforschung*）并赞许地描写了其工作和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²在他回到柏林后给摩根施特恩的一封信中，他感谢了米塞斯、摩根施特恩、马赫卢普、里夏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 Strigl）和埃瓦尔德·沙姆斯（Ewald Schams），“我们共同知识领域中最多元化的代表”。³

考德的入门书《大讲堂》（*Repetitorium*）展示了从桑巴特主义经济史和社会学，向以奥地利学派传统为特色的现代经济学说史的转变。在考德继续引用其导师的同时，他依靠奥地利学派的工作来解释他向经济学初学者介绍的许多

¹ Emil Kauder to Ludwig von Mises, July 9, 1956, Ludwig von Mises Papers (LvMP), Grove City College Archives.

² Kauder 1932, pp. 117, 128–30.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翻译为我自己的。

³ Emil Kauder to Oskar Morgenstern, February 13, 1932, Oskar Morgenstern Papers (OMP), Duke University. 在后来的著作中，考德回忆起 1931 年在德累斯顿参加的一次社会科学会议，那里爆发了一场关于价值无涉的辩论。他说，奥地利学派的代表——米塞斯、摩根施特恩、弗朗茨·魏斯（Franz Weiss）——在数量上完全被德国历史学派所超越。

核心思想。桑巴特是考德提到的第一作者，但这位年轻的德国人依靠庞巴维克对财货的定义以及门格尔和维塞尔对财货互补性的路径，为考德所称的“经济生活和经济科学”奠定了基础。考德不仅表现出对原初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欣赏，他还表现出对当前讨论的兴趣。汉斯·迈耶的学生，尤其是保罗·罗森施泰因-罗丹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 Schönfeld）将互补性确定为现代经济理论中的突出问题，并宣称“新奥地利学派”是最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群（Schönfeld 1924; Rosenstein-Rodan 1927, 1933）。⁴汉斯·迈耶的工作是这些考虑的核心，考德在《大讲堂》的开头几页中对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⁵

《大讲堂》主要不是分析性或论证性的文本，但奥地利学派的印记是深刻的，尤其是在当代更感兴趣的领域。考德的许多章节都始于桑巴特对经济概念的定义，但他并没有在理论方面给这位德国人最后的发言权。考德从门格尔那里汲取了他对演绎和归纳的方法论理解。他使用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法则的定义和维塞尔的归属（*Zurechnung*）概念来计算成本和生产价值。庞巴维克对资本和利息的论述主导了这一主题的章节，而米塞斯对货币起源和货币理论的理解则成为了货币部分的基础。⁶在讨论通货膨胀等当代经济问题时，他严格遵守奥地利学派支持的反通货膨胀措施和严格的金本位制。在商业周期理论方面，他更喜欢哈耶克和摩根施特恩的演绎路径，而不是哈佛晴雨表和恩斯特·瓦格曼（Ernst Wagemann）的商业周期研究所的“经验-统计”方法（Tooze 2001; Friedman 2013）。尽管他自己逐渐倾向于奥地利学派及其对现代理论的看法，但他观察到“在今天的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学派取得了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Herrschaft*】。”虽然他不相信新的方法论论战（*Methodenstreit*）即将到来，但他认为围绕价值无涉、方法论以及有机主义与机械主义路径的斗争将在短期内继续定义该学科。⁷

没有主要的学术期刊评论考德的《大讲堂》，它似乎也没有对德国经济学产生影响。尽管他努力争取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基于这项研究的未来工作提供资助，但最终一无所获。然而，这项工作对考德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继续承认桑巴特对现代社会科学贡献，考德的理论转向促成了一次突破。1932年3月，他向摩根施特恩讲述了决定性的遭遇：

最近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周二早上，我在我通常教书的书店里遇到了维尔纳·桑巴特。他以最友好的语气抨击了：1. 我；2. 一般的现代经济学。我显然是一个叛逃者，而现代经济学家只是“工具制造者”。尽管他对我滔滔不绝地连续发问，但我并不清楚什么是“工具制造者”，或者我们真正制造了什么样的工具。他质疑这种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价值，他认为存在深刻的哲学差异，决定了人们选择边际效用理论还是劳动理论。这种深刻的哲学差异在我看来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但我让他平静地咆哮。⁸

⁴ 这种互补性概念超越了门格尔和维塞尔的概念，更充分地融入了时间的作用。

⁵ Kauder 1932, pp. 1–2.

⁶ Kauder 1932, pp. 15–21, 69–80, 85–7.

⁷ Kauder 1932, pp. 117–119, 128–135, 146–50.

⁸ Kauder to Morgenstern, March 24, 1932, OMP.

无论是《大讲堂》，还是与其学术赞助人的决裂，对他的未来前景都不是好兆头，但他作为教师的声誉让他经常受雇。正是以这种身份，考德在延续奥地利传统方面发挥了另一个重要作用。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是他皈依奥地利学派之后的第一批学员之一。他们两人背弃了桑巴特的方法，研究起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尤其是迈耶和哈耶克的作品（Lachmann 1977）。在 20 世纪 30 年代，考德在智识上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更接近了，因为他们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展开了共同的斗争。考德在 1938 年写了一篇文章批判凯恩斯的分配、失业和信贷扩张的观点，其中利用了哈伯勒对凯恩斯乘数的方法论批判，以及哈耶克具体体现在《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中的对周期和生产的替代性理解。他对凯恩斯最大的批评在于后者试图在囤积和生产过剩的摇摇欲坠的概念上建立一整座宏观经济的大厦：“对许多当代人来说——不幸的是，不仅对‘街上的人’来说——危机意味着普遍的生产过剩；廉价货币的人为增加，任何不考虑盈利能力的生产扩张都意味着经济状况的永久改善。在他的书中，他并没有从一开始就采取批判态度，而是试图提供证据来支持这些流行的想法和信念。凯恩斯本可以从他的伟大同胞培根那里了解到，科学家必须消除所有偏见，甚至是‘市场的偶像’。”考德认为凯恩斯的概念与现实不符，因此敦促拒绝这位英国人的路径（Kauder 1938）。

考德移民前的著作几乎没有受到学者的关注，但它为他后来的历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先例。我们看到他将桑巴特的社会学方法——体现在贝歇尔传记和《大讲堂》的历史章节中——与现代奥地利学派理论进行了有趣而独特的融合，这将成为他后来对现代政治经济学史和边际效用理论诞生的描述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承认亚里士多德是经济理论的真正奠基人，其理论随后通过经院哲学、重商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派，最后是现代理论家的工作，提供了一幅他和后来的穆瑞·罗斯巴德以及许多美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最具说服力的蓝图。这一著作为何失传与考德一生的共同创伤有着很大关系：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移民和适应美国的艰辛经历。

与他的维也纳同时代人不同，考德对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危机的调整既不迅速，也不天衣无缝。考德来自一个“种族犹太人”家庭，在 1933 年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掌权后立即面临着它的迫害。尽管他因其早年的国民服役而挺过了 1933 年 4 月《恢复专业公务员制度法》所引发的第一次犹太教师淘汰，他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1933 年 6 月，考德从“更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写信给摩根施特恩，解释说还没有经历过纳粹学生的任何人身攻击。他们继续参加他的课程，但技术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的学生会禁止他在军营中提供指导。“我真的是犹太种族（那是什么？）中不是受到蔑视而是受到鼓励的最后讲师（Dozenten）之一，……更重要的讲师没有这样的运气。”纳粹的接管使他无法完成他在货币理论方面的工作，因为“我在下一天还能否教书的不确定性，关于一切的不确定性”笼罩着一切。⁹考德还没有谈到移民，可能是因为他 60 岁的犹太母亲住在德国。他提交给援助组织的最早文档可以追溯到 1937 年。在接下来的 4 年中，他向援助流离失所的外国学者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提出了四次未成功的呼吁，该组织曾帮助维也纳流亡者埃里希·胡拉（Erich Hula）和费利克

⁹ Kauder to Morgenstern, June 3, 1933, OMP.

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分别找到新学校（Krohn 1993; Feichtinger 2001）。¹⁰考德那些更知名的维也纳盟友（哈伯勒、马赫卢普等）在欧洲和美国寻找学术职位都受益于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相关的赞助网络，不同于他们，考德没有这样的联系来促进他的过渡。1938 年他离开欧洲时，并不是为了学术职位；他做过农场工人和学校老师。不幸的是，他的母亲欧内斯汀没有和他一起踏上旅程；她在大屠杀中丧生（Wasserman 2016; Fleck 2011; Hagemann and Krohn 1999）。

1939 年至 1947 年间的时期对考德来说是真正的荒野年代。他没有获得永久的学术职位，没有写文章或书籍，他与奥地利学派的通信也中断了。他曾在新泽西州和密歇根州担任学校教师。他的兴趣似乎转向了宗教和神话在人类对民族精神和历史的理解中的地位的问题，正如他在移民后的前两篇文章以及他与维也纳移民埃里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的通信所证明的那样（Kauder 1946, 1950）。¹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他的社会学和历史主义起源的回归。一旦考德于 1947 年获得怀俄明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的全职学术任命，这些关注点就让位给了他的主要关注点：经济思想史和（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出现。

虽然考德在技术上重新进入了学术界，但他的贫困状况和怀俄明州拉勒米市的地理偏远使考德的孤立感永久存在。他全年教书，包括夏季学期，很少有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他开设了经济思想史、社会学思想史、贸易政策、金融理论、社会动力学和历史理论等课程。他向摩根施特恩寻求建议——他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反复这样做：“我想从事与经济理论相关的工作。你知道我能做什么吗？我一直对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很感兴趣，也许我可以在这个领域工作。”考德与他的奥地利同行们如此疏远，以至于他多年来都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朋友们的消息，尤其是那些在欧洲的朋友。他已经忘记了美国全国经济会议在何时何地举行。他也没有足够的钱参加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会议。¹²摩根施特恩建议考德继续研究经济学说史，这是考德的专长，因为“学说史在美国被如此忽视，你应该能够在这个领域找到对你和你的同事有价值的东西。”¹³考德将这一点铭记在心，开始了将定义他职业生涯后半段的工作。

1950 年至 1957 年间，考德深入研究经济思想史，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作为他的杰作《边际效用理论史》的概念验证。他的第一篇文章（Kauder 1953a）追溯了从亚里士多德到 1800 年边际效用理论的起源。他认为“边际效用理论的历史有好几次必须改写。三杰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只知道戈森是他们的先行者。今天，我们认识到对经济评价中主观因素的分析始于亚里士多德。他开创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著作中留下了大量的痕迹。”¹⁴在这种解释中，考德声称追随奥地利学派的布拉格成

¹⁰ 参见 Emil Kauder,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records, Box 79, Folder 42,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¹¹ Eric Voegelin to Kauder, January 20, 1947, Box 20, File 32, Eric Voegeli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¹² Kauder to Morgenstern, September 14, 1948, OMP.

¹³ Morgenstern to Kauder, November 19, 1948, OMP.

¹⁴ Kauder 1953a, p 638.

员奥斯卡·克劳斯（Oskar Kraus），他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确定了效用理论。考德断言，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在他们的早期作品中遵循了类似的逻辑，尽管他无法确定这些维也纳人是否意识到了这种联系。

在边际效用的这种最早的历史中，考德产生了一个新颖的（和特殊的）知识谱系。更多的是一个想法的历史，而不是对该概念的历史传播和演变的重建，考德在边际效用和奥地利学派故事中引入了一系列新角色：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胡戈·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吉安·弗朗切斯科·洛蒂尼（Gian Francesco Lottini）、贝尔纳多·达万扎利（Bernardo Davanzatti）、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罗伯特·杜尔哥（Robert Turgot）和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illi）。虽然考德推断性地将这些人物向后与亚里士多德以及向前（至庞巴维克）联系起来，但他的证据基础无疑是薄弱的。尽管如此，考德证明，自中世纪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时期，总有学者将“主观评价……作为一种思维方法的基石。这个理论必须针对新的古典系统进行辩护。”也许是出于个人的失望，考德感叹这些学者

徒劳无功，他们很快就被遗忘了……相反，我们经济科学之父写道，水的用途很大，价值很小。亚当·斯密用这些话把 2000 年的思想浪费了。错过了从 1776 年而不是 1870 年开始更正确地了解价值原理的机会。¹⁵

考德在这篇文章之后发表了一篇（Kauder 1953b）将边际效用理论的故事带到了 1870 年，即所谓的现代理论的诞生。他探索了不同的价值评估方法如何完全独立地共存和发展。考德回到他的社会学训练中，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韦伯式/桑巴特式的解释：“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造成两种对立观点之间的分界线的不是无知，而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和新教社会学派。意大利-法国主观价值学派的成员是天主教徒，而成本价值论的捍卫者是新教徒，这并非巧合。”¹⁶考德还断言，劳动理论家在学术上的突出地位使边际主义者没有智识基础来发展他们的观点。这种社会学方法引起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无论是他对政治经济学起源的宗教解释，还是他对亚里士多德或劳动理论的解释都不准确（Henderson 1955）。

尽管如此，至少经济学界的一个角落对考德将边际效用传统延后的努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围绕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尤其是穆瑞·罗斯巴德形成的圈子。1956 年，考德与米塞斯重新建立了联系；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的通信更加频繁。罗斯巴德被考德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联系起来的尝试吸引了。他写信给沃尔克基金会（Rothbard 1957），热情地认为：

考德通过攻击斯密和李嘉图受到【新教的】影响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从而将韦伯论点转向了自己的追随者。熊彼特也倾向于这个方向。这个重要的新论点带来的冲击是：与其说休谟和斯密几乎是从头开

¹⁵ Kauder 1953a, pp. 647, 650.

¹⁶ Kauder 1953b, p 565.

始发展经济理论，不如说经济学实际上是由经院哲学家以及受经院哲学家影响的意大利和法国天主教徒几个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缓慢但确切地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普遍是个人主义的，强调效用理论、消费者主权和市场定价，而斯密通过注入纯英国的劳动价值论学说确实使经济思想倒退，从而使经济学脱离了正轨一百年。

罗斯巴德进一步推动了考德的论点，认为不仅边际效用理论而且自由放任思想都起源于像巴斯夏这样的法国天主教思想家。鉴于考德致力于发展自由市场理念，他理应得到沃尔克的支持。在他的余生中，罗斯巴德几乎在每一段经济思想史里都回到了考德的工作之中。

在这些文章的最后一篇（Kauder 1957），考德总结了他对边际效用的解释：奥地利学派及其创始人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他现在将维也纳人置于他们的知识和历史背景中，强调了**两场**争取承认的斗争：与德国历史学派和瓦尔拉斯“数学”学派。考德将注意力从受到更多学术关注的前者，即方法论论战，转移到了后者——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们最终认为它更为重要。他提出并捍卫了门格尔对瓦尔拉斯的立场。门格尔的观点代表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思维原则”。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1) 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数量，而是核心概念的“本质”；2) 方程式只会导致任意陈述；3) 经济学家必须以零碎的方式建造他们的大厦，慢慢地添加现实的假设。只有这样，真正的经济学才会出现，通过因果起源而非功能性的理解。

考德扩展了他早先关于奥地利学派路径的亚里士多德起源的论点，现在也增加了康德认识论的元素。为了支持他早先的主张，他求助于新的消息来源。在摩根施特恩和小卡尔·门格尔的建议下，他联系了卡尔·门格尔藏书所在的东京一桥大学。丸上秀夫（Hideo Marukami）告诉考德，在门格尔未发表的文章中有来自康德第一批判的大段文字，考德使用了这些文章：“门格尔所创造的是一种最新的理论与一种哲学的结合，这种哲学在 1883 年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庞巴维克批准了这种综合。维塞尔选择了他自己的方式来证明理论知识的正确性，但最终，本质在他的思维方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这些知识，考德开始驱逐不符合他对学派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符合的维也纳人——鲁道夫·奥斯皮茨（Rudolf Auspitz）、里夏德·列本（Richard Lieben），最重要的是约瑟夫·熊彼特——被视为叛教者。那些使他了解奥地利学派运动的早期知识的人物也一去不复返了：汉斯·迈耶、保罗·罗森施泰因-罗丹和利奥·舍恩菲尔德。¹⁷

对亚里士多德的诠释仍然是异类的，古人与门格尔之间的联系仍然是推论性的和微弱的，但考德的奥地利学派思想史被证明是有影响的。他不仅定义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原则，而且还产生了一种知识谱系。在三位创始人之后，只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视为真正的追随者，因为他致力于精确法则：

今天，只有三位先驱最忠实的学生冯·米塞斯保持了经济法则的本体论特征。他的人在行动理论（用他的话说是行动学）是“对行动本质的思

¹⁷ Kauder 1957, pp. 412–15; 此处，415.

考”。经济法则提供“本体论事实”。如果理性的个体在自由市场中行动，本体论结构就会物化。至少在理论上，米塞斯的老师们也非常喜欢自由市场机制。¹⁸

对于考德来说，庞巴维克、维塞尔和米塞斯都是“社会本体论者”，他们认为存在一个针对现实的总体计划，并且存在与该计划相关的社会现象。那么，奥地利学派定义就不仅是主观评价——与洛桑和杰文斯的路径相同，而且还包括其哲学现实主义和社会本体论。奥地利学派现在也是一个自由市场学派，这一主张被 20 世纪之交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许多行动和著作所掩盖。

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考德的个人和职业环境都经历了好转。1952 年，他离开怀俄明大学前往位于伊利诺伊州布卢明顿市的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1961 年，他为了“更多的薪水，更少的课程”而转到佛罗里达长老会学院。在过渡期，在摩根施特恩的敦促下，他多次前往东京，在此期间他对门格尔的藏书进行了编目和挖掘。他在期刊上报告了这些发现，并为门格尔藏书的书目撰写了序言（Kauder 1959, 1961a, b, 1962a）。此外，他利用这段时间发展了对奥地利学派运动的解释，特别是寻求与古典哲学的联系。他还开始写他的《边际效用理论史》（Kauder 1965）。¹⁹

对于熟悉他 20 世纪 50 年代作品的任何人来说，考德的《理论史》涵盖了广泛的基础，但该项目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对他来说更加紧迫。在他的手稿简章的早期版本中，他基于缺少一本好的英语边际效用思想史来为这本书的优点辩护。他主要担心新思想，即凯恩斯主义，已经取代了边际效用方法，他的研究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写出来。²⁰ R.S. 豪伊（R.S. Howey）1960 年出版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The Rise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School, 1870–1889*）进一步激怒了考德。《兴起》以传统的方式重述了边际革命：它是 19 世纪中叶的一场运动；它在多个场所并行发展；不同的方法应该得到同样的认可。豪伊对奥地利人不屑一顾，考德对此不以为然。考德对这本书做出了暴怒的反应，“这不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他继续说：“我可以随意扩大错误列表。在本报告的最后，我忍不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显然不懂德语的作者要写关于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文章？”考德认为有责任捍卫奥地利学派的路径免受误解和贬低（Kauder 1962b）。²¹

《理论史》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考德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就边际效用理论提出的论点，因此我们将把自己限制在一些观察中。首先，这本书不仅证明了他对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热情，还证明了他融入了维也纳社区。他采访了里夏德·许勒尔和小卡尔·门格尔。他与摩根施特恩、米塞斯、马赫卢普、哈伯勒和奥托·温伯格（Otto Weinberger）讨论了这个项目。其次，这本书延长了他早期的调查，这些调查通常在 1880 年左右结束。他确定了奥地利学派的四个时期：1）发现（1870；门格尔）；2）系统化和整合（1880–1927；庞巴维克和

¹⁸ Kauder 1957, p 417.

¹⁹ Kauder to Morgenstern, June 29, 1961, OMP; Kauder to Mises, August 5, 1961, LvMP.

²⁰ Kauder 1965, p xvi.

²¹ 有关早期简章，请参见 Kauder to Morgenstern, date unknown, OMP.

维塞尔)；3) 新边际主义(1920–1947；迈耶、罗森施泰因-罗丹、舍恩菲尔德、米塞斯)；4) 分散(1943–；米塞斯、冯·诺依曼/摩根施特恩，处理偏好和无差别的学派)。最有趣的是，他将博弈论置于奥地利学派血统而非“数学”传统之中。在拒绝归属与价值之间的直接联系时，考德将米塞斯和摩根施特恩并列，因为他们都将归属视为一个价格问题。²²第三，他对边际效用理论给出了精辟的定义；奥地利人最接近于解决所有问题：“消费者行动的理性特征；效用的性质；效用递减法则；总效用和边际效用；预算规划和战略；归属；效用的衡量。”在进行这些评估时，他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认识论偏好。除了米塞斯，没有其他学者像考德那样强调消费者和消费者主权在奥地利学派方法中的地位。对于最近关于内省、直觉和行为主义的讨论，他参考了费利克斯·考夫曼、阿尔弗雷德·舒茨和弗里茨·马赫卢普的作品（更不用说米塞斯研讨会上的几首饮酒歌曲了！）²³最后，这本书在下半部分范围超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路径，展示了考德的知识宽度。

如果可以根据评论者的声誉来评估一本书的重要性，那么考德的《理论史》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即使这些评论褒贬不一。特伦斯·哈奇森(Hutchison 1966)、沃伦·萨缪尔斯(Samuels 1966)和莱昂内尔·罗宾斯(Robbins 1966)都是评论者。每个人都对考德的档案工作以及他对我们对门格尔的了解的补充表示赞赏，但对于文本的其余部分，赞美却很少。哈奇森质疑考德偏爱门格尔而不是杰文斯，拒绝将摩根施特恩纳入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的故事，并批评该书在近期发展方面不够清晰。塞缪尔斯称赞了“对理解经济理论史的这一阶段的重要贡献”，但他对考德的工作仍然持矛盾态度，因为它自始至终表现出对奥地利学派思想几乎不加批判的党派偏见。最后，塞缪尔斯耸了耸肩：“因此，对一些人来说，这本书将代表对美德的新呼唤；对其他人来说，则是来自过去的徒劳哭泣。”另一位评论家称其与其说是一部边际效用理论史，不如说是“一部高度个人化的历史”和“一场论战”。对于罗宾斯来说，这本书令人失望。它承诺对边际主义进行系统的处理，并且似乎旨在提供“人们希望的综合……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发生。”其对奥地利学派的没有焦点的报道，以及考德无法对其观点进行充分的分析和批评，让罗宾斯感到特别不安。罗宾斯说，这本书没有上升到以前的研究水平，也没有提高对边际主义关键发展的认识。

尽管有这些评论和观察到的缺点，但《理论史》巩固了考德在战后奥地利学派社区中的地位。它还提供了该学派的标准叙述，许多后来的学者以此为基础进行叙述。不仅罗斯巴德将其用于他的历史记录（例如 Rothbard 1976），哈耶克(Hayek 1968)也在他关于该学派的百科全书文章中使用了它。反过来，哈耶克的文章为马赫卢普关于该学派的文章奠定了基础(Machlup 1982)。这些文章对于理解奥地利学派运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²² Kauder 1965, pp. 185–7. 在第 223 页，考德承认边际效用在博弈论中几乎没有作用，并且“摩根施特恩圈子的经济学家将不再对价格和边际价值之间的传统关系感兴趣”，即使作为迈耶学生的摩根施特恩也是如此。

²³ Kauder 1965, pp. 122–3. 关于消费者评价的中心性，参见 xv, 3, 38, 161, 228–30.

考德一直致力于奥地利学派运动和奥地利学派思想，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写了一篇关于庞巴维克的百科全书条目。他还写了一部关于维也纳世纪末的思想史，将奥地利边际主义者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立了起来。

（Kauder 1970）。他描绘了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的迷人的异花授粉。他甚至声称，主要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Otto Bauer）、卡尔·伦纳（Karl Renner）和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将边际主义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使他们成为比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优秀的社会思想家。对他来说，两个奥地利群体之间的争论代表了现代经济学中最精彩的经济辩论，因为双方都从接触中获益。这与方法论论战以及凯恩斯主义者与非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辩论截然不同。他将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让这些思想家出现的独特的维也纳环境。就个人而言，他还与米塞斯、摩根施特恩和小卡尔·门格尔保持联系，直到他们各自的生命结束，继续寻求在当代讨论中发扬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的方法。

除了这些最后的学术著作外，考德还参加了 20 世纪 70 年代奥地利的“复兴”运动。他参加了第二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会议，用旧世界的故事取悦同行们。大卫·亨德森（David Henderson）讲述了 74 岁的考德的活力（Henderson 2012）：

你听说过埃米尔·考德吗？他是一位老奥地利人，在南佛罗里达大学任教。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他似乎老了，直到有一天晚上，每个人都在听【利兰·】耶格尔声称政治家应该有原则，而考德开始大喊大叫以引起注意。“不，不，”他说，“当政治家有原则时，你最终会得到不可说的阿道夫。”……考德接着给我们讲述了一些伟大的奥地利人的故事，例如熊彼特。他的故事不是老人的故事。他告诉他们的方式充满活力，他的故事简洁。他通常会专注于告诉我们人们的身体特征。他形容熊彼特看起来像一个爪哇神。有人问他熊彼特是不是出生在德国。考德说：“不，是奥地利，像苹果卷（apple strudel）²⁴一样。”他是一位骑士般的老绅士。当有人向他敬酒时，他会鞠躬。

到他生命的尽头，出生在德国的考德已经成为“奥地利人”——至少在年轻一代的美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眼里是这样！

埃米尔·考德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在奥地利学派传统中科学遗失和科学发现的一个引人入胜的案例研究。他的传记展示了鲜为人知的移民在寻求在美国重新立足时所面临的挑战。他从知识分子的默默无闻中走出来，既要归功于他的智识敏锐，也要归功于移民美国的维也纳经济学家网络的帮助。在智识上，他在恢复边际主义传统方面所做的工作几乎与战后的奥地利人一样多。虽然他本人不是主要的理论家，但他对边际效用的历史解释为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和其他人的持续重要性提供了理由。他发掘了奥地利学派已遗失的智识遗产，并且比任何其他学者都更能解释卡尔·门格尔的思想。当代奥地

²⁴ 苹果卷是一种传统的维也纳馅饼。——译者注

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欠考德一份感激之情，因为他的思想仍然是当代理解奥地利学派的起点。

致谢

作者要感谢 Botstiber Institute for Austrian-American Studies 和阿拉巴马大学研究资助委员会对这项研究的慷慨资助。他还感谢彼得·贝奇（Peter Boettke）邀请他在沃斯研究所（Wirth Institute）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会议上展示本文的早期版本。最后感谢该研讨会的所有参与者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参考文献

- Backhaus, J. (1996).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Social scientist, 3 vols.* Marburg: Metropolis.
- Backhaus, J., & Mueller, F. (1994). On Sombart.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52, 48–71.
- Boettke, P. (2002).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within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4, 337–360.
- Craver, E., & Leijonhufvud, A. (1986). The emigration of the Austri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 1–32.
- Dekker, E. (2016). Left luggage: Finding the relevant context of Austrian economics.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9, 103–119.
- Feichtinger, J. (2001). *Wissenschaft zwischen den Kulturen*. Frankfurt: Campus.
- Fleck, C. (2011). *A transatlantic hist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Bloomsbury.
- Friedman, W. (2013). *Fortune tellers: The story of America's first economic forecast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 Hagemann, H., & Krohn, C.-D. (Eds.). (1999). *Die Emigration deutschsprachig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nach 1933*. Munich: Saur.
- Hayek, F. (1968). Economic thought: The Austrian school. In 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p. 458–462). New York: Macmillan.
- Henderson, J. (1955). The retarded acceptance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Com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 465–473.
- Henderson, D. (2012). Report on the Austrian Economics Conference, 1975.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https://www.econlib.org/archives/2012/01/report_on_the_a.html. Accessed 18 Feb 2019.

Hutchison, T. W. (1966). Review of Emil Kauder, a history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The Econometrics Journal*, 76, 611–612.

Judt, T. (2012). *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Penguin.

Kauder, E. (1924a). Johann Joachim Becher als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er. Dissertation, Friedrich-Wilhelm-Universität

Kauder, E. (1924b). Johann Joachim Becher als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er. *Schmollers Jahrb für Gesetzgeb, Verwalt, und Volkswirtsch*, 48, 811–841.

Kauder, E. (1932). *Repetitorium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Vienna: Springer.

Kauder, E. (1938). Emil Kauder, Distribuzione, disoccupazione e ampliamento del credito (Osservazioni critiche sull'ultimolibro di Keynes). *G degli Economisti e Riv di Statistica* 78: 206–221

Kauder, E. (1946). Ideal history: Remarks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Wave Theory.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28, 209–216.

Kauder, E. (1950). The Holy Ghost and the National Spirit. *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26, 44–60.

Kauder, E. (1953a). Genesis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The Econometrics Journal*, 63, 638–650.

Kauder, E. (1953b). The retarded acceptance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7, 564–575.

Kauder, E. (1957).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roots of the older Austrian school.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17, 411–425.

Kauder, E. (1959). Menger and his library. *The Economic Review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10, 58–64.

Kauder, E. (1961a). Freedom and economic theory—Second research report on Menger's unpublished papers.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2, 67–82.

Kauder, E. (1961b). Introduction. In: Menger C Zusätze zu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Hitotsubashi, Kunitachi, Japan

- Kauder, E. (1962a). Aus Mengers nachgelassenen Papiere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89, 1–28.
- Kauder, E. (1962b). Review of R.S. Howey, the rise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school, 1870–1889.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88, 75–76.
- Kauder, E. (1965). *A history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Kauder, E. (1970). Austro-Marginalism vs. Austro-Marxism.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 398–418.
- Klausinger, H. J. (2006). ‘In the wilderness’: Emigr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ustrian schoo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8, 617–664.
- Krohn, C.-D. (1988). Die Emigration der österreichischen Schule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die USA. In F. Stadler (Ed.), *Vertriebene Vernunft* (Vol. 2, pp. 402–425). Vienna: Jugend und Volk.
- Krohn, C.-D. (1993). *Intellectuals in exile: Refugee scholars and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Amherst: Univ of Mass Press.
- Lachmann, L. (1977). *Capi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market process*. Kansas City: Sheed and Ward.
- Lenger, F. (1994).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Eine Biographie*. Munich: CH Beck.
- Machlup, F. (1982). Austrian economics. In: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McGraw-Hill, New York, pp 38–43
- Metzler, M. (2013). *Capital as will and imagination: Schumpeter’s guide to the postwar Japanese miracle*.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 Robbins, L. (1966). Review of Emil Kauder, a history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Economica*, 33, 347–348.
- Rosenstein-Rodan, P. (1927). Grenznutze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 4, 1190–1223.
- Rosenstein-Rodan, P. (1933). La Complementarietà: Prima della tre tappe del progresso della Teoria Economica Pura. *Riforma Soc*, 44, 257–308.
- Rothbard, M. (1957). Memorandum on Protestantism, Catholicism, and Capitalism. Mises Institute. <https://mises.org/library/memorandum-catholicism-protestantism-and-capitalism>. Accessed 18 Feb 2019.

- Rothbard, M. (1976). New light on the prehistor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In E. Dolan (Ed.), *Foundation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pp. 52–74). Kansas City: Sheed and Ward.
- Samuels, W. (1966). Review of Emil Kauder, a history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Science*, 151, 1377.
- Schmelzer, M. (2010). *Freiheit für Wechselkurse und Kapital*. Marburg: Metropolis.
- Schönfeld, L. (1924). *Grenznutzen und Wirtschaftsrechnung*. Vienna: Manz.
- Sieferle, R. P. (1995).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Frankfurt: Fischer.
- Slobodian, Q. (2018). *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 Tooze, A. (2001). *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Walpen, B. (2004). *Die offenen Feinde und ihre Gesellschaft*. Hamburg: VSA.
- Wasserman, J. (2016). ‘Un-Austrian’ Austrians: Haberler, Machlup, and Morgenstern and the post-emigration elabora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34, 93–124.
- Wasserman, J. (2019).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How Austrian economist fought the war of idea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